

祝尚书 著

宋元文章学

中華書局

初尚书 著

宋元文章学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元文章学/祝尚书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3.9
ISBN 978-7-101-09573-9

I. 宋… II. 祝… III. 文章学-研究-中国-宋元时期
IV.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6396 号

-
- | | |
|------|---|
| 书 名 | 宋元文章学 |
| 著 者 | 祝尚书 |
| 责任编辑 | 俞国林 郁震宏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7 $\frac{3}{4}$ 插页 2 字数 450 千字 |
| 印 数 | 1-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9573-9 |
| 定 价 | 86.00 元 |
-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宋元文章学著作述略	12
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文章学专著	12
第二节 宋元时期的文章评点本	23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学术笔记	31
第二章 宋元文章学兴盛和成熟的历史契机	37
第一节 科举制度变迁是宋代文章学兴盛的动因	37
第二节 时文程式化是文章学成立的“接生婆”	40
第三节 诗赋格法是宋元文章学借鉴的丰富资源	45
第四节 中国文章学的成熟与成立:孝宗时期	50
第三章 宋元文章学的基础:时文以古文为法	61
第一节 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提出	62
第二节 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内涵与方法	65
第三节 时文“以古文为法”的途径:文章评点	71
第四节 时文“以古文为法”的缺陷与流弊	74
第四章 宋元文章学论作家修养	79
第一节 宋代学者论“养气”	79
第二节 陈绎曾论“养元气以充其本”	82
第三节 陈绎曾论养心定志以牢立脚跟	84
第四节 陈绎曾论“养题气以极其变”	87
第五节 陈绎曾论“养力”以开辟文路	89
第五章 宋元文章学论认题与立意	94
第一节 “认题”与认题法	95
第二节 “立意”与立意法	100
第三节 宋元评点本论认题与立意	104

第四节 认题立意理论的价值与缺陷	110
第六章 宋元文章学家论行文	115
第一节 方颐孙论“遣文格”	116
第二节 陈绎曾论古文“制法”	122
第三节 论行文难易、繁简与放胆、小心	127
第七章 宋元文章学论修辞	137
第一节 陈骙《文则》论譬喻十法	138
第二节 宋元学者论其他修辞格	145
第三节 修辞格的价值及其运用的有限性	156
第八章 宋元文章学论造语与下字	159
第一节 “造语”与诗文造语	160
第二节 陈骙《文则》论句法	162
第三节 朱熹、陈傅良、方颐孙论造语下字法	169
第四节 陈绎曾论造语下字法	177
第九章 宋元文章学论用事与引证	182
第一节 宋人论诗赋及四六文用事	183
第二节 南宋文章学家论用事与援引	187
第三节 陈绎曾论文章用事法	191
第四节 用事之误与用事之繁	195
第十章 宋元文章学论辞赋	199
第一节 宋元学者论赋体演变与律赋作法	200
第二节 郑起潜《声律关键》论律赋	209
第三节 宋元学者论类事赋	223
第四节 陈绎曾、祝尧论古赋	230
第十一章 宋元文章学论四六及韵语	247
第一节 四六文的源流与体式	248
第二节 “宋体四六”及其流派的文章特征	254
第三节 论“荆公派”四六作法	257
第四节 论“东坡派”四六作法	263
第五节 “宋体四六”两派的优劣得失	270
第六节 王应麟论四六作法	272
第七节 陈绎曾论四六文作法	276

第八节	宋元学者论韵语源流、体式与作法	281
第十二章	宋元文章学论论体文(上)	290
第一节	宋元时期论体文的地位与程式演变	290
第二节	南宋论体文的程式法	296
第三节	方颐孙、方逢辰论论体文结尾	305
第四节	经义的程式与作法	313
第十三章	宋元文章学论论体文(下)	319
第一节	方颐孙论立论法	319
第二节	方颐孙论论证法	327
第三节	方逢辰论论体文立意法	332
第四节	谢枋得论论体文行文法	341
第五节	林图南论论体文作文法	346
第十四章	宋元文章学论记序文	357
第一节	记、序的源流及宋代“变体”	357
第二节	记、序文的体式与作法	365
第三节	记、序文的行文技巧	372
第十五章	宋元文章学论风格	384
第一节	论宋代古文典范作家的风格	385
第二节	论宋体四六典范作家的风格	395
第三节	陈绎曾论各体文风格	406
第四节	宋元学者论风格形成的原因	413
第十六章	宋元文章学的成就、流弊与出路	418
第一节	宋元文章学的成就:以法为文	418
第二节	郝经对宋元文章学的批评:以技为文	422
第三节	宋元文章学的出路:变死法为活法	428
后 记		437

绪 论

宋、元两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是中国文章学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但由于这时的文章学文献与科举考试有着太多的牵连,在古代与近现代文化发生断裂之后,便与后者一起,被激进的学者们弃之如敝屣,很少有人光顾。然而文化的血脉是剪不断的,中国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近二三十年来迅速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而且热度甚高,并已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受科举考试株连、极具宋元特色的这块文章学“弃地”,也在春风和煦中萌动着生机,或将成为一方新的学术热土,抽出春芽、绽出新蕾来。

笔者曾在宋代科举与文学这块土地上徜徉垦植有年,象老农似的沉湎其中,乐此不疲,虽收获甚菲,倒也有些“凿井汉机忘”(卢照邻句)的喜悦。现在又踱到“宋元文章学”这片“弃地”上,放眼环顾,虽算不上风光旖旎,有的还颇煞“风景”,但也不乏令人怦然心动的胜境奇观,因而战战兢兢地,又想试试步了。在正式进入课题写作之前,有必要对宋元文章学的总体认识及本书如何构撰的设想,先向读者略作交待。

一、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熟与成立^①

所谓“文章学”,并非要另立一门新“学”,它不过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其功能与诗学、词学一样,若简单明了地表述,就是研究文章写作理论的学问。文章学不等同于“写作学”,前者侧重于写作理论研究,后者偏向于对具体写作实践(文本)的研究,当然二者是可以有所交叉或重叠的。文章学研究也不同于“文章研究”,前者研究的对象是文章学文献,而后者的对象则是文章作品,包括对文章文本的解读、分析以及对其写作方法、艺术技巧的探讨等等,二者非但不相排斥,而且互为基础。没必要将文章学的概念和功能扩大化,它并

^① 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熟、成立的时代,目前学界正在讨论中,有学者认为在六朝,也有人主张在宋代(特别是南宋)。在没有达成共识前,本书姑采宋代(南宋)说。

不承担研究诸如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作家及作家群体之类的任务,也无关乎传统意识形态中的“道德文章”。宋人或称文章学为“笔法学”。^①按“笔”指无韵的散文,^②顾名思义,“笔法”即文章写作法,“笔法学”也就是文章学。柳宗元曾感叹道:“古今号文章为难,……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③文章学就是解决诸如文章如何认题立意,以及它的间架结构、声律音韵、造语下字、行文技法等等“知之”方面的问题,正因为“难”,才吸引着古今学者探索的兴趣。

我国的文章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严格地说,有了文章,若有人品评其写作得失,也就有了最早的“文章学”。不过,科学意义上的文章学,盖萌芽于先秦时代,到汉代已有相当发展,而至魏晋六朝,已经产生了如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等专门论著。只是前者盖主要研究文体(一般认为它是《文章流别集》中“论”的结集),且久已残佚;后者虽十分杰出,但无法超越其时代限制,特别是唐以后文章体制及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巨大变迁,彦和不可能进行总结。因此,魏晋六朝时期,仍只能是文章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文心雕龙》则是这个阶段的辉煌里程碑,是为文章学的隆重奠基,但还算不上完整、系统并成熟的“文章学”。陈望道先生曾在《修辞学发凡》第十二篇《结语》中说:“古来留传给我们的诗话、文谈、随笔、杂记、史论、经解之类,偶然涉及修辞的,又多不是有意识地在作修辞论,它们所述的范围,照例是飘摇无定;每每偶而涉及,忽然又颺开了,我们假定限定范围去看,往往会觉得所得不多。”因此,陈氏称这是“修辞学术萌芽时期”。魏晋六朝的文章学,较陈氏所说修辞学的状况可能要好得多,但刘勰生活在骈文时代,《文心雕龙》对文章之学的阐述,也难免有“飘摇无定”的现象。

随着隋以后科举时代的到来,为适应和满足新的社会文化的需求,文章学因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就广义文章学论,逐渐由萌芽、发展、成长以至繁茂。唐人研究诗、赋、文章的专著,尚多见于著录,少数流传至今。诗学兹不论,就文章而言,如杜正伦《文笔要诀》,今存一篇,题为《句端》,^④专门研究文章句首的

① 宋人陈岳《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序》引用反对者的意见道:“或者且谓‘风行水上’善矣,何必规规执笔法学为如是之文也?”

② 见《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得失十病》引《文笔式》:“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③ 《与友人论为文书》,《柳宗元集》卷三一。中华书局1979年校点本,第829页。

④ 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附录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该本用日本贵重图书影本刊行会影印五岛庆太郎所藏平安末期写本为底本。

“发端词”，以教“新进之徒”，如“观乎”、“惟夫”、“原夫”、“若夫”之类。这类发端词，多用于赋和骈文的文意转换之处。“句端”以后还有没有下文？若有，其内容如何？已不可考，因此还不能断定它是一部系统的文章学著作，最多或只是探讨文句各部位的虚字用法。唐人王瑜卿《文旨》一卷、王正范《文章龟鉴》五卷、孙郃《文格》二卷、倪宥《文章龟鉴》一卷、冯鉴《修文要诀》二卷等，皆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八》，但这些书都久已失传，它们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到底只是杂记、随笔之类，还是已有系统的文章学理论？已难确认。唯《郡斋读书志》卷二〇著录冯鉴《修文要诀》二卷，解题谓其“杂论为文体式，评其谬误，以训初学云”，那么，此书主要应是谈为文“体式”，而方法则是“杂论”，大约也不成体系。只有唐佚名所撰《赋谱》一卷，^①研究科举考试所用律赋的结构、句法、用韵、题目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赋学专著，也是现存科举时代最早的一部体系完整的文章学著作。从此，文章学便深深打上了科举的烙印，这是它的鲜明特点。

唐末五代以后，文章学似乎没有太大发展，或者说相对衰落。直到南宋以降，研究古文、时文、四六文文法成为潮流，研究范围也由科举而后超越科举，文章学于是兴盛，与诗学（包括词学）、赋学鼎足而三。在这个长时期中，学者们揭示了许多文章学规律，其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当代编成《历代文话》一书的著名学者王水照先生认为，“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②已故国学家王利器先生在陈骙《文则》的《校点后记》中指出：“陈骙《文则》，是最早的一部谈文法修辞的专书。尽管远在齐梁时代，杰出的文论专家刘勰就在《文心雕龙》里提出了很多有关文法修辞的问题，后来的讨论和单篇文章里，也仍有论述，但一直没有成系统的专门著作。”他也认为宋孝宗时出现的这部文章学专著具有标志意义。不过，“开始涌现”似可修正为“全面涌现”，因为如上述《赋谱》这种独立的文章学著作，诞生年代远在有唐，而宋代（主要在南宋）与之不同的是，文章学论著像开闸似地不断问世，研究对象也扩大到狭义“文章”的各种文体，成果形式则在专著之外增加了选本评点、学术笔记等。笔者赞同王水照先生关于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宋代的观点，^③只是觉得“宋代”这个时限过长，以创立于南宋孝宗时代似乎更确切，标志是陈骙《文则》、陈傅良《止斋论决》、吕祖谦评点本《古文关键》等的相继问世。

^① 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附录三。

^② 《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③ 见《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载《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此外,学术笔记大谈文章,这时也首开其端,并逐渐蔚然成风。如洪迈《容斋随笔》十六卷,作于孝宗时,相继又撰成《续笔》、《三笔》、《四笔》。此前,用笔记谈诗的不少,虽偶也论文,但像《随笔》这样用大量篇幅论文(主要是四六文),尚属首见(后人辑为《容斋四六丛话》,今犹传世)。其后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黄震《黄氏日抄》等等,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成为文章学除专著、评点本之外的另一重要部类;而学术笔记由于形式灵活,其作者群也成了文章学研究队伍中相当活跃的一翼。要之,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虽是先秦至六朝时期文章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和发展的里程碑,产生于唐代的《赋谱》可视为现存专论律赋文法之“第一部”,但它们都“形单影只”,稀闻嗣响,只有到南宋时期方形成集团推进之势,文章学才真正臻于繁荣,也才有正式“成熟”或“成立”的客观条件。

笔者认为,若论中国文章学“成熟”乃至“成立”,至少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基本理论要有涵盖性,即能大体覆盖整个中国文章学。二是理论要具系统性和丰富性。像人一样,即便四肢五官具全,尚不得称为“成熟”,必待血肉丰满,身强体壮,心气凝定,然后方可当之。三是要有代表性的文章学专著;四是研究要有持续性,即文章学家辈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若“一枝独秀”而弥望茫然,显然还不算“成熟”或“成立”。当然,所谓“成熟”、“成立”不过是个形象的说法,因为它毕竟无形,不像庄稼瓜果那样可以目测口尝,也不像社会组织那样可以对外宣告,只是说这时的文章学发展到了相对的巅峰期,学理所认同的成熟条件已经满足。就上述四点论,刘勰时代的文章学不可能成熟,只能算是“具体而微”,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文章学成熟或成立的标志,倘若定位于“奠基”,也许更恰当。像修房子一样,奠基与建成,还有很大距离。因此,将文章学的成熟或成立确定在南宋,是合乎历史实际的。应当慎重指出:“奠基”是伟大的功绩,笔者断无贬低刘勰及《文心雕龙》的意思。

如果我们拓宽视野,关照所有的“文章”,文章学可分广义与狭义两类。研究“所有的文章”,即广义文章学,此类“文章”指所有载于典册的文字,无论有韵无韵,是骈是散,是单篇还是专书。广义文章排除诗(包括词、散曲),再排除专书,就是狭义的“文章”,若研究之,便是狭义文章学。^①换言之,狭义文章学只研

①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曰:“按编内所载,均谓之文,而此类独以‘文’名者,盖文中之一体也。其格有散文,有韵语,或仿《楚辞》,或为四六,或以明神,其体不同,其用亦异。”徐氏所言,即“文”的广义(“编内所载”,即典册所载)、狭义(“此类”,即徐氏《序说》所列)两类。

究单篇“文章”，不含诗词曲，也不含专著。本书研究的，即所谓狭义文章学，包括散文（古文）和韵文，韵文又含赋（包括古赋、骈赋、律赋）、骈文（包括四六）、韵语（包括箴、铭、赞、颂）三类。

从南宋直至元末，是狭义文章学蓬勃发展的时期。首先，如上所述，这时期的文章学专著和评点本密集问世，学术笔记中谈文章成为常态。其次，文章学的原创性理论，主要产生在这个时期，明、清以后同类著作虽多，但“炒陈饭”的现象也相当严重，创新度明显不足。这时期的文章学著作有个鲜明特点，即以科举用书和与科举有关的论著为主流，所讨论的也多是场屋时文文法，包括“以古文为时文”的方法。这毫不奇怪，任何学术都是为当前文化建设服务的。由此不难发现，文章学之所以在这个时代成熟、成立，背景正是南宋初科举考试的全面程式化；^①或者说，程式化了的科举考试的需求，既是文章学蓬勃生长发育的肥沃土壤，也是文章学成熟、成立的天然“接生婆”。虽北宋已有学者主张时文“以古文为法”（见本书第三章引唐庚语），但古文究竟有何“法”可以运用于时文，时文又通过何种途径向古文学习，皆不甚了了。只有到这时，学者们不仅研究时文程式，同时又用时文程式反观和解构古文以及作为骈文“后代”的四六文（包括与四六作法相近的律赋），将两者打通并形成互动，方才全面认识了古文、四六文文法，然后再将古文法度引入时文，既提高了时文的写作水平，也使古文创作有法可循。因此，宋、元学者研讨时文程式，却多以古文名篇为范式，原因就在这里。

二、文章学的研究范畴与本书的任务

台湾学者仇小屏博士认为，“文章学内涵可大分为‘外律’与‘内律’，‘外律’指的是文本分析之外的相关学科领域（含文道论、文气论、品评论、文境论、文运论），‘内律’指的是着眼于文本分析的学科领域（含意象学〔狭义〕、词汇学、修辞学、文法学、章法学、主题学、文体学、风格学）。”^②对文章学内涵的问题，她给出的主要是学科类别的答案。这虽也可成一说，但似乎有可议之处，即如此论“内涵”，很难体现文章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点，若用来说明文章学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许更恰当些。窃以为，所谓文章学内涵，应该是“文章学”这个概念

^① 关于科举时文的程式化，详参拙文《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② 《吕祖谦〈古文关键〉文章论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60页。

所直接包含的内容,它是从文章创作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指导写作实践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文章学内涵应该揭示出“文章学”解决了文章写作中的哪些理论问题,也就是它能够为写作提供理论支撑并指导写作活动的具体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所谓“内涵”。笔者以为,文章学内涵十分丰富,若撮其要,盖有如下九项:作家修养论,文章认题、立意论,文章结构论,文章行文论,文章修辞论,文章造语下字论,文章用事、引证论,文章风格论,文章活法论等。以上九项,又可大分为纵、横两个维度:前者总结和论述文章学的普遍规律和法则,后者则是阐述各体文章的文章学理论。当然,两大维度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所谓普遍规律与法则,是从各体文的文本研究中抽象出来的,而各体文章的文章学理论,又是普遍规律的实际运用;前者为文章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而后者又不断地检验、丰富并支撑着普遍规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文章学的内涵,决定了本书的写作任务。在交待任务前,还须说明我们为如何将研究时限框定在“宋元”时期(所谓“宋”,实际上又特指南宋孝宗以后,有时可适当前推),——原因有二:一是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孝宗朝,现存的重要文章学著作,也主要产生在南宋以后,故以此作为起点;二是宋人许多重要的文章学研究成果,是由元人进行整理、归纳和完善、发展的,如果单论宋,则必然牵涉元;如果单论元,便有其终而无其始,故以为最佳方案是宋、元合论,将两代归并整合为一个“时期”进行考察。南宋孝宗至元末(1163—1368),跨越了整整两个世纪,历时不可谓不久,有着足够的研究空间。

本书以考察、论述宋元文章学家对文章学的普遍规律和各主要文体的结构、作法等的研究成果为主要任务。近三十年来,虽也有不少学者在从事文章学研究,成果也不可谓不丰,这是应当肯定的;但在笔者看来,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研究者对古代文章学文献重视不够,重实用轻理论,将“文章研究”等同于“文章学研究”;而研究宋元时期如《文则》、《古文关键》、《论学绳尺》等文章学著作的论文(台湾学者犹有不少专著),又不太注意将它们上升为“文章学”,更缺乏建构文章学体系进行整体观照的成果。笔者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宋元时期的文章学原著,且欲进行体系建构的尝试。自知心大力小,又无成例可循,对如何方可建构起一个合理、科学的体系框架来,心中其实无数,就只好试着自创了。首先(前三章),略考文章学现存的主要文献,讨论文章学在宋孝宗时代成熟、成立的历史原因及其建构途径,为进入这时期的文章学研究作准备。接着(第五至第九章),对宋元文章学家们研究文章学普遍规律及法则如认题、立意、行文、修辞、造语、下字、用事与引证等一系列问题的丰富成果进行总结。然后

再用五章(第十至第十四章)篇幅,研讨宋元文章学家对辞赋、四六、策、论、记、序等主要文体的结构、作法的研究,他们在此花费的力气最大,成果也最多。具体写作时,对所谓“普遍规律及法则”的研究,与对各体文文法的研究,难免有所交叉和互见。以上是本书主体部分的三个板块。在古人眼里,修养被看作是做人、特别是作家——宋元时期基本上是官、学合一,统称“士大夫”——的头等重要大事,而风格则是修养的呈现,故本书在进入文章学研讨后(第四章)和研讨行将结束前(第十五章),分别论述宋元文章学的作家修养论和风格论。最后(第十六章),再回头讨论宋元文章学的成就、局限与出路问题,作为全书的总结,而其中要论及的文章“活法”,则是全书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命题。

应当说明,本书的任务既是研究宋元学者的文章学成果,而他们的文章学研究范围,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选择的,并非对所有文体都感兴趣。比如碑志文、奏状、书信等,在宋元文中存量极大,但对它们进行文章学意义上研究的学者却很少,成果也极有限(如元潘昂霄《金石例》,虽专门研究碑碣墓志等,但主要考察的是制度,对碑志文的写作罕有论及)。由于本书是研究宋元时期的“文章学”而不是“文章”,故架构并不以现存文章数量为根据,而是以是否有相对较重要、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取舍。

根据上述构想和设计,再谈谈对三个板块的认识,它们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一系列论点借以建立的基础。

一、文章学视野中的时文“以古文为法”

时文“以古文为法”,是宋元文章学发展的道路,也是构成宋元文章学的基础。如果排开古文唯谈时文,那就只有时文的程式法则,不可能成为内涵丰富的文章学;反之,如果只论古文而不及及时文,则不是那时文章学的完整面貌,且无法认识宋元学者建构文章学的社会历史原因。两者结合,相辅相成,文章学才有了丰富的内涵和迅速成长的动力。因此,时文“以古文为法”,反之又以时文程式解构古文,才有了宋元文章学的庞大体系和丰富成果。唯其如此,研究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内涵与方法、途径,便成了进入文章学旅程的开端。

二、文章写作体系中的行文论

诗赋格法为文章学提供了现成的研究范畴和术语群,如认题、立意、布置、修辞、造语、用字、句法、用事、转换、段落等等。这些范畴,《论学绳尺》统称之为“行文法”。文章学沿用诗学的学术术语,说明诗歌与文章在写作上有相通之

处,它们同属于广义的文章学范围;而辞赋本身就是“文”(韵文),只是它的文章学建构早于散文及其他韵文。当然,诗赋格法所提供的范畴、术语的内涵,与一般文章学又有很大不同,特别体现在韵文与散文体制的差异上。比如“布置”,诗、赋的“布置”与论、记、序这些散体文的“布置”,差别就很大。本书之所以将认题、立意、修辞、造语、下字、用事与引用等置于文章学写作体系之中,因为它们既非古文、也非时文所独有的行文方法,而是从古文、时文中提炼出来并上升为“文章学”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行文理论。

三、文章结构体系中的文体论

“明体”是我国古代文论的基础之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是广义的,既包括诗和乐府,也含诸子、史传。南宋人孟程曰:“君子之学也,饫于所闻,而发挥于文章。诗歌之懽怨,论议之明遂,择配联异而四六之,陈事达意而賤论之,识人之美而铭之,道鬼神梵策之请而疏之。裒言类法,以详古人之业;志时明谊,以记有造之绪。文之体至多也,葩芬锦烂,日炫云移,制幅以为程,融性以尽神。”^①则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写法,故“识体”既是文章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进入文章学的必经之途。只有识体,方可“制幅以为程,融性以尽神”。陈骥《文则·辛》述文体道:“考诸《左传》,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他所谓“八体”,一曰“命”,二曰“誓”,三曰“盟”,四曰“祷”,五曰“谏”,六曰“让”,七曰“书”,八曰“对”;而所谓“各系本文”,即他所研究的八体,皆举《左传》之文以为“则”。《文筌·古文谱五》“文体”,将文分为“叙事”、“议论”、“辞令”三大类,叙事类包括叙、传、录、碑等十四小类,议论类包括议、说、辩、赞等二十五小类,辞令类包括诏、诰、册、榜等十二小类。每小类皆简要地说明其文体特征及源流,如“议”为“切事而议,奏议、杂议”,其源是三《谟》,流为汉议、《(唐)文粹》、《陆宣公集》、《宋诸臣奏议》。又如“说”为“明说其理”,其源为说、杂说、《孟子》、《列子》,流为韩、柳、欧。又《文式》卷上论各体文的写法,如议“宜圆折深远”,说“宜平易明白”,等等。若考察宋代的文章学著作,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形:在众多的文章体裁中,文章学家们所关注并着力研究的,主要是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首先是赋、策、论、经义,它们用于进士科、制科考试;其次是制、诰、表、记、序、箴、铭等四六和韵语,它们是词科考试的科目。这说明,宋元学者的文章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实用性。因此,本书将分体论述辞赋、四六及韵语、策论、记序,这包括了狭义

^①《省斋集跋》,《四库全书》本《省斋集》卷首。

文章学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体,既有古文也有时文,既有散文也有韵文。

三、关于本书写作中的一些问题

在谈本书写作的具体问题之前,先说说如何调整“心态”——主要指对科举时文及时文程式法研究论著的“心态”,因为宋元时期文章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科举时文的体制与作法,而这些是被“打倒”、“批判”了一个多世纪的东西。更长远地看,自科举制度形成之日起,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可说科举是在批评声中成长、壮大的。批评并非一无是处,不少批评可谓深中其弊,从而使科举从制度层面进行自我修复或改造,并获得新的生命。但是,作为连续传承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以及用以取士的“文章”其及作法,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没有对它的深入研究,那是很可悲的,所谓“批判”也必然流于肤浅,很难击中要害。

近年来,学界对自隋以至清末科举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已达成一个重要共识,即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是相当先进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尽管由于它自身的弊病和历史的进步决定了最终将被埋葬,但再也不能简单地将它全盘否定甚至妖魔化,科举制度应当属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部分。

至于“时文”,乃相对“古文”而言,指时下科场流行的、按程式写作的、专用于考试的文章。盖时文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流行于一时;二是在流行的时期内,又有着基本固定的程式。就本质论,“时文”与一般文体并无区别,正如元代作家刘将孙所说:“文字无二法。自韩退之创为‘古文’之名,而后之谈文者必以经、赋、论、策为时文,碑、铭、叙、题、赞、箴、颂为古文,不知辞达而已矣,时文之精,即古文之理也。”^①时文其实就是一般的文体,但当它专用于考试并成为定式之后,就自成一类了。如六韵律诗,八韵律赋,程式化的策、论、经义等,其写法有着独特的规定,与一般的诗赋、古文有所不同。后人诟病科举,罪状之一就是时文的程式化。前面说过,科举时文的全面程式化是文章学成熟、成立的“接生婆”,因为复杂的程式为年轻士子所畏惧,而将程式条理化,将每个环节的写作方法理论化,就可变难为易,它满足了社会的迫切需要,特别受举子们的欢迎,——这就是时文程式化之所以能催生文章学的原因。比如论体文,其程式有冒子(包括破题、承题、小讲、入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等,如何写好冒子,又如何原题、讲题等等,就是文章学的任务,这无异于提醒学者们:包括古文在

^①《题曾同父文后》,《养吾斋集》卷二五。

内的所有文章,原来都是有“法”可寻的。因此,作为研究,我们不必先对古文、时文心存轩輊。不过时文既是科场博利禄的玩意儿,的确又是科举考试各种弊端的重要载体,也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刘克庄《徐先辈集序》曰:“及韩、柳出,天下知有古文。然韩、柳能变文字之体制,而不能变科举之程度。上以此(指骈文、律赋)取,下以此应,虽豪杰之士,不能自拔。”^①到宋代,虽有欧、苏的古文运动,但此种格局仍不可能改变。这既是科举社会定了型的文化背景,也是那个时代为“文章”设置的抹不掉的“底色”。因此,对科举考试的工具——时文,虽然它大多算不上文学作品,也有很多流弊,但仍然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研究的“文章”。只要我们破除陈见,摆正心态,敲碎时文程式化的僵硬外壳,其合理的文章学内核就会放出光芒;而如果没有宋以后一代代学者对时文程式并进而对古文文法的精心剖析,也就不存在内涵丰富的“文章学”这笔优秀的文学遗产。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谈到唐、宋以律取士及明、清八股文时,曾说:“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②这是就程式法和按程式法写作的时文而论。他对“定格”的批评是对的,类似的贬辞还很多,有的比这更激烈。肇端于唐宋、泛滥于明清的时文作法论著,讲的多是时文程式化后的定格和死法。但程式不等于程式化,任何文章都有一定的程式,俗称“格式”;“死法”之“法”不一定错,错在人们将它用“死”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格式衍生出来的“法”和“技”,就没有文章。若一听“程式”就产生先天的反感,其实那是将“程式”与“程式化”混为一谈,是失去理性的神经过敏,即便不是中了长期盲目“批判”的毒,至少也是严重误解。若将唐至明清研究时文的论著一把火烧掉,那固然痛快,但也坠入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深渊,我们在这上面吃过的苦头已经够多了。启功先生在谈八股文时,曾说:“文体来自语言次序,某种常见的次序又多是实践中选择出来的。选择的标准又常是由效果好而定的。用久用多了,成了传统,成了套子,沿用的人也忘了它的所以然。假如我上两节课,讲一篇文章或一项问题。每段之后,有人在旁边高唱‘破题’、‘承题’、‘第一股’、‘第二股’,不但要全场哄堂而笑,我自己也会苦笑着‘心悦诚服’。这只说形式的自然形成,谁也不会认为每次的‘两节课’、‘三小时’所讲内容必然都是‘毒草’吧?”^③宋元时期研究时文的程式法论著,道理与此相同。当然,对它们的缺陷和流弊,我们也必须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②《日知录》卷一六《程文》。

③《说八股·引言》,启功等《说八股》,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页。

有着清醒的认识,决不回护。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本书写作中,将会遇到如下两个令人棘手甚至“头痛”的问题。

一是宋元时期的文章学资料十分零碎和散乱。无论文章学专著、评点本以及散见于子部、集部书中的文章学文献,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所谓零碎、散乱,说得直白些,即宋元学者表述文章学思想的方式,大多是无序的“条”或“段”,即便是今天所说的“专著”,也多为“条”、“段”的集合。鉴于此,我们只能在研究中聚零为整,铢积寸累,将碎片“拼接”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文章学体系。但也因为材料零碎、散乱,缺乏规范,即便论述的是同一问题,各人所用概念、表述方式和对该问题的理解,都有所差异,虽经“拼接”仍难以“无缝对接”,有时还有扞格不入的现象。笔者只能尽力在差异中求同,但若不能消泯痕迹,做到“天衣无缝”,就干脆不加缀合,各述其义。这既是笔者力所不及的无奈,也是宋元文章学的特征所在,要请读者理解和谅解。

二是宋元人的部分文章论著十分繁琐。这个问题有两面性,一方面反映了宋元学者对文章学研究的精细,但同时也是斗奇逞富、相互炫耀的一种“推销”方式,难免冗滥之弊。比如他们论句法、字法、立意法、行文法、风格等,列出的“法”动辄十多种,甚至数十上百种,往往精粗不分,玉石杂陈。如果我们要将那些“法”一一胪举并诠释,势必同样冗滥而不成文章,读来令人生厌;而其中的不少“法”,原作者未作阐释或论述,年代久远,现在已很难给出准确的解读。因此,我们在行文中多用撮要或举例的方法,进行有选择的解说,这也要请读者理解和谅解。

最后,有两项内容决定排除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外,也须作个交待。其一,古文、时文评点本,其中的圈、点、撇、抹之类,由于多次翻刻,加之印刷等方面的原因,很难辨别正误真伪。明戴许光《重刻〈文章轨范〉跋》曰:“是书原本一点一勒,具有精义,其不加圈评者,诚非后学所宜妄添。但板久废失,间有遗册,圈评漫漶,淆讹不少。兹特悉依古本(按指元刻本),细加校订,字里行间,无毫发遗憾。”由此可见传本漫漶、淆讹的情况。虽戴氏自称他的校刻本“无毫发遗憾”,然类以明人刻书习气,恐怕只是为了获取“广告”效应而已,事实上舛讹定会不少。同时,圈、点、撇、抹等符号所反映的,是圈点者的主观感受,所谓“精义”并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就算圈点者的水平很高,如果今天单凭符号强作解人,那只能是以己度人,甚而“郢书燕说”,没有学术价值。因此,本书对评点本中的圈点等概不论述。其二,除评点本外,宋元人还编刻了许多古文、时文的“白文”选本,这当然也是表达、宣传文章学主张的一种方式,但编选者的文章学思想是潜意识的,亦不敢妄作猜度,故也不在本书的研究和论述范围之内。